

赖勤芳◎著

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

——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

A Modern Re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Classics: A Study to Lin Yutang's
Writing for Telling China to Foreign People

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

——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

A Modern Re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Classics: A Study to Lin Yutang's
Writing for Telling China to Foreign People

赖勤芳◎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赖勤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386-8

I. ①中… II. ①赖… III. ①林语堂(1895~1976)—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42 号

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

ZHONGGUO JINGDIAN DE XIANDAI CHONGGOU

——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

赖勤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386-8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言 探析入西讲中的早期标本

自从中国被迫向现代化的西方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往愈益频繁而又错综复杂,如何在新的世界文化现代性平台上重新打量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更准确地理解我们与之频繁交往的西方他者,就成为中国现代文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林语堂先生,正是中国现代文人中较早面向西方、用英语阐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先行者中颇为成功且影响力巨大的一位。如今,当“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赫然成为国家战略时,回头来看林语堂当年以个人的语言实践开展的“对外讲中”活动,就具有了毋庸置疑的早期“标本”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勤劳的这部以剖析这个早期“标本”为己任的著作的出版,就是及时的了。当然,大约六七年前,当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劳提出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时,他那时对后来才越来越明确和重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想必并无先见之明,而主要是凭着对林语堂先生作为中西文化交往先行者的敬重之心去尝试加以理解和反思。不过,今天回头看,他这样的理解和反思在当前确实有着远比当时的选题初衷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了。今天应当怎样向外国公众讲解中国、勾勒中国形象?通过反思林语堂实施的语言创造实践,无疑可以找到一面镜子。

记得勤劳在着手探讨林语堂的“对外讲中”实践之初,曾面临两种研究途径的选择:一种是探究林语堂的“对外讲中”英文著述本身,着重分析英语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经典及文化形象建构;另一种是分析已翻译成中文的林著,着重考察其针对西方文化语境而作出的语义重构,进而窥探内含的中国经典及

文化形象。第一种途径最为理想、也最为必要,但勤劳考虑到那需要丰厚的英语语言和文化素养,却非自己所长。他自己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阶段都修中文,并在硕士生阶段时师从杜卫教授,对林语堂的相关活动已有一些前期研习。如果现在的博士论文能同时联系西方语境和中国语境去比较林著同其他相关著述的意义,其学术价值也不可替代。考虑到这一点,他选定了第二种途径。由于这一选择,他就不能不放弃相当美妙动人的第一条道之风景,而只能流连忘返于第二种风景了。是无奈中的抱憾,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勤劳在书中集中考察林语堂对中国经典的重构,专注于作者如何对中国文化加以重新“编码”,使其焕发现代灵性。他以林语堂对中国经典的系统重构为主线,以其代表性作品为例证,尽力复原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早期先行者的芳踪。该书先是从总体上梳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发现林语堂运用了“以道释儒”策略,认为这正是林语堂理解和重构中国文化品性的一种新维度。我认为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接下来的全书主干,是具体地分析和评价林语堂对中国和谐文化、闲适文化、家族文化、传奇文化的重构。勤劳在这些地方都注意发掘林语堂的独特用心。对尤其著名的长篇历史传记《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他评点说,林语堂是想通过对苏东坡、武则天两人迥异的人格特征描写,实现借中国历史关怀西方现实、达成和谐人格建构的意图。在考察《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影响较大的作品时,认为其意图在于着力伸张晚明性灵传统或小品精神,由此把中国文化经验合理化,勾勒出一一种中国国民新形象,使中国文化的潜在价值在西方得以彰显。他还指出,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和《唐人街》分别通过日常生活描写和理想家庭想象,蕴含了林语堂对中国“家”文化及其优质面的独特品评。至于《中国传奇》,他认为这是林语堂用“重编”办法而“以新形式出”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体现出中国古典与西方浪漫情调的跨文化交融,体现出描写人性、追求视域融合的显著特点。这些论述从总体上勾画出林语堂在身处于其中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经典的多层面重绘和有意识改写。

这部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是在上述具体分析基础上,从现代性角度对林语堂的“对外讲中”写作实践加以论述和评估。勤劳相信,当林语堂将中国文

化移入西方现代文化语境进行重新探测时,实际上是开辟出中国文化重构的新路子,刷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认知范式的理解,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现代性认同意识,可以说总体上达到了中国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一个新境界。当然,他没有满足于全盘赞美林语堂,而是冷静地剖析了林著中存在的局限及不足,例如无政府主义意识、选材上的偏心、“文化乌托邦”意念及一些简单化处理等。这就使他对林语堂的分析带有了辩证的眼光,增强了论述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读罢勤劳的上述论析,人们想必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林语堂并非一般地“对外讲中”,而是属于一种入西讲中,即是主动移入西方语境本身,尽力按西方语境需要而讲述中国故事。对外讲中,意味着我向外国居民讲述中国,传者着眼于向受者传达中国,重心在传者;入西讲中,突出的则是传者移居到受者中间,面对或贴近受者需要而讲述中国,重心在传者与受者的互动。比较起来,正是入西讲中策略,使林语堂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化研究著述得以超越一般的“对外讲中”水平而开掘出新的文化亲和力及历史深度。当我们遗憾于到目前为止仍未能目睹对林语堂的英文原著本身的分析成果问世时,勤劳的这部对其中译本著作的分析成果就无疑具有自身的独特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了。当人们承担起急切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时,不妨冷静地重新反思林语堂当年的入西讲中实践。中国文化不应简单地我行我素地或以我为主地“走出去”,而是应瞄准外国居民及其特定文化需要而作出有针对性的清晰筹划,制订合理的措施,采取合适的具体策略。正是这样,勤劳对林语堂经验的反思在当前就具有了切实的意义了。



2012年3月3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言 探析入西讲中的早期标本	王一川 1
绪 论	1
一、林语堂研究现状述评	2
二、“对外讲中”：一个独特的写作现象	15
三、研究视角、方法与结构设置	24
第一章 以道释儒：中国文化精神的阐扬	30
第一节 “现代庄子”的人文情怀	31
一、体验道家	31
二、支援儒家	34
三、“合理性”	37
第二节 圣人形象的消解与重建	41
一、去政治化	42
二、文学还俗	45
三、文化中介	48
第三节 “孔老会谈”的新视界	51
一、资源累积	52
二、对话意识	54

三、协商之道	58
第二章 和谐至上:历史的转义与人格的传记表征	64
第一节 《苏东坡传》:快乐士人的自我形塑	65
一、“心”存苏东坡	65
二、“幽默”的天才	68
三、“伊壁鸠鲁派的信徒”	71
第二节 《武则天传》:悖谬智性的历史反讽	75
一、“犯罪者”	75
二、“反智者”	78
三、“移情者”	80
第三节 传体革新:另一种意义	83
一、传体形式的扩展	83
二、小品笔调的输入	85
三、真实内蕴的谋求	87
四、人格意识的凸显	91
第三章 入忙贵闲:闲适文化的小品依托与化分	97
第一节 “闲适小品”的现代生成	98
一、在误读中发现	98
二、在信任中契合	103
三、在沉溺中超越	111
第二节 “格调”的生活化	117
一、以“闲”药“忙”	117
二、以“游”适“闲”	121
三、以“隐”彰“闲”	124
第三节 诗意的“中国人”	128
一、“淳朴”之美	128
二、“乐”之崇尚	131
三、“身”之激活	134

第四章 家园之恋:家族文化的长篇小说演绎	138
第一节 “长篇小说”:文体体认与文化凝定	139
一、人生的适应	139
二、情效的诉求	142
三、民族性移置	145
四、形象的表列	147
第二节 《京华烟云》:日常生活的极致表达	150
一、集成的家族意象	151
二、近情的日常态度	153
三、习俗的反复插叙	156
第三节 《唐人街》:移居生活的完美想象	160
一、展示家庭优性	161
二、再现童年经验	164
三、怀旧情绪生产	167
第五章 异国情调:中国传奇的“重编”及其文化利用	170
第一节 有意味的结尾——《中国传奇》的爱情叙事	171
一、通约的冲突形式	171
二、化“悲”为“喜”	174
三、变奏的浪漫情调	178
第二节 侠义文化的“稀”释——从《中国传奇》到《朱门》	182
一、聚焦《虬髯客传》	183
二、侠义元素的抽绎	184
三、人性内涵的新纳	188
四、“主题借鉴”	190
第三节 世俗的拯救——从《中国传奇》到《奇岛》	193
一、暧昧的“乌托邦小说”	194
二、人间景象的“设计”	196
三、文化理想的“归化”	200

结 语 通向转化传统的途中·····	204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26

绪 论

本书尝试考察林语堂(1895~1976)的“对外讲中”写作及其作品。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个体生命历经 2/3 世纪历程,不仅写作、翻译了大量的作品,而且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题”,诚如著名作家徐訏所感叹的那样,“我相信他在中国文学史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林语堂基本被视作一个“另类”的文化人形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然而,一个最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林语堂的生活历程伴随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其中的一个既具有普遍价值取向又具有特殊追寻路径的“现象”。对任何文化现象,只有将其放在整体文化背景和历史的描述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同时,也只有结合相应的文化史实和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才能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林语堂的文化实践应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我们认真探索的显要存在之一。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审“林语堂现象”^②必将

① 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传记文学》(台湾)1977 年第 6 期。

② 戴嘉树的《林语堂现象:东西文化的夹缝》(《集美师专学报》1990 年第 1 期)一文,不仅指出林语堂是“处于东西文化夹缝的文人”,而且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林语堂的意义,认为“比革命反革命这两种极端的人文更具有研究价值”。杜运通的《伊甸园之歌——林语堂现象透视》(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从“思想透视”、“作品研究”、“人生盛宴”、“回眸撷英”等几个方面对林语堂的思想、创作、人品及林语堂研究的“风风雨雨”进行了微观细绘和宏观把握,对“林语堂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反思。本研究将“林语堂现象”视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富有诱惑力的文本,认为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读解。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绪论分三部分：一是评述林语堂研究现状，主要概述林语堂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分析其中的得与失；二是提出本研究的目标，阐明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内蕴特征；三是交代本研究的视角、方法与结构设置。

一、林语堂研究现状述评

（一）林语堂研究概况

1. “相得”——“疏离”——“相得”：大陆对林语堂在接受

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曾这样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轻轩于其间也。”^①后人多用“相得”与“疏离”来形容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个词也可以大致描述大陆对林语堂这一历史人物的接受情况，因为人们在过去对林语堂的评价基本是以鲁迅之是非而是非。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以来是大陆与林语堂的“相得”期，而40~70年代则是“疏离”期。过去，人们比较肯定“语丝”时期的林语堂，而对“论语”时期的林语堂多有批判。此时期围绕林语堂展开的“论战”不少，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风于1935年元旦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林语堂论》。此即大陆与林语堂之间的第一个“相得”期。^②40~70年代大陆的林语堂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难免有份量的学术成果。这主要是因为林语堂基本生活在海外，国内对他的关注远远不及他在离开大陆以前。第二个“相得”期出现在70年代末至今。此时段关于林语堂研究的单篇论文达600余篇（根据相关报纸期刊论文目录索引统计）。8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新一轮文化潮带动了“林语堂热”的兴起。林语堂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不断被出版，被大众置于案头而成为一种“时尚”。至

^① 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

^② 林语堂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钱玄同在《语丝》第23期发表的《回林语堂的信》一文。（参见杜运通：《林语堂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目前,以散文为主的集子就有众多版本,如《林语堂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林语堂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林语堂散文》(2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林语堂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3 年版)、《林语堂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4 卷,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林语堂散文全集》(2 卷,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林语堂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林语堂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等。尽管《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作品在海外出版之后即有不同的中译本出现,但此时期仍有一些新译本出现。如郝志东、沈益洪于 1994 年推出的《中国人》是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全译本。包括《苏东坡传》在内的这四部著作是林语堂所有作品中再版率最高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4 年出版了 30 卷的国内最全全集版《林语堂名著全集》(依据台湾译本)。作家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群言出版社也分别于 1996 年、2005 年、2010 年推出了 10 卷本、22 卷本、9 种 10 册的《林语堂文集》。群言出版社还在同年推出 31 卷本的《林语堂全集》。九州出版社计划在 2012 年出版《林语堂全集》(56 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2009 年推出了有 10 余种《林语堂英文作品集》(目前仍在出版中),这对促进全面研究林语堂的意义不容小觑。在众多作品出版的同时,林语堂传记、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涌现出以万平近、施建伟、王兆胜等为代表的一批“林学”研究专家。此外,林语堂的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尤其是《京华烟云》。由赵薇等主演的 44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于 2005 年在央视播出,2008 年曾突破当年央视收视纪录而成为“单打”冠军(台湾于 1987 年播出了赵雅芝版)。可以说,林语堂其作其人已经成为当今大陆大众视野中的一个文化“亮点”。

顺便提及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的情况。港、台两地均以资料发掘为主,公开了大量的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的资料,其中又以台湾更为突出,如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传记文学》杂志和《林语堂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 1981 年版)、《回顾林语堂》(正中书局 1996 年版)两书。金兰文化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了 33 卷本的《林语堂经典名著》。与大陆相比,台湾有分量的林语堂研

究学术专著较少。但就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翻译力度而言,台湾要远甚于大陆。东吴大学于2006年10月举办了“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大陆在内的众多学者参与了此会,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夏志清初版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没有专门述及林语堂。2000年1月,他在香港《明报月刊》第409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其中这段话值得注意:“在当年,以中国人身份在美国写畅销书的,就只有林语堂一人。到了今天,华裔作家在美国出版英文作品的已经相当多,值得《亚洲周刊》或《明报月刊》派人去观察这方面的情形。”此文现已作为附录收入大陆中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①余英时于1994年9月写的《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一文高度肯定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认为他的中国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流行的倾向”和“中国精神世界的一个向度”,并且指出他是一个“反正统而非反传统”之人。在谈到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获得成功的条件时,他认为林语堂是“懂得西方但又不随西方的调子起舞”^②。余英时长期生活在美国,对林语堂其人有所闻,对他的作品也有所读。他的所思也反映出海外学者对林语堂的一种态度。近邻日本对林语堂的接受与研究情况也值得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林语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本已超过26种,几乎涉及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方面。九州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明清文学研究家合山究是当代日本的中生代林语堂研究专家。^③

2. “闽、沪、京”三地联袂:当代林语堂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林语堂在离开大陆前主要活动地是厦门、北京、上海三地,而当代林语堂研究的众多学者也大致出现于这三地。可以说,当代林语堂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群体性和地域性特点,形成了以闽、沪、京三地为中心的基本格局。

① 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三)》,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438页。

② 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467页。

③ 参见冯羽:《日本“林学”的风景——兼评日本学者合山究的林语堂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1期。

(1)闽。主要以万平近为代表。作为林语堂的家乡福建漳州,人们自然对这位“山地之子”情有独钟。2001年10月在天宝镇五里沙村建立的大陆首家林语堂纪念馆正式开馆。^①2006年9月林语堂研究会在漳州成立。2007年12月,漳州师范学院、漳州市政府联合举办了旨在打造林语堂文化品牌的大型活动。会议期间,举办了漳州林语堂纪念馆扩馆开展仪式、林语堂文学馆开馆和“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堪称学界的一大盛事。^②闽地林语堂研究的代表人当属万平近,不仅起步早,而且著有《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林语堂评传》(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再版)两书,在林语堂研究方面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泉州)、漳州师范学院等高校中也有多位林语堂研究专家,如俞兆平、陈旋波、周可、陈煜斓等都曾发表多篇论文或相关论著。此外,还有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沪。主要以施建伟为代表。他著有《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由《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两书合并而成)、《林语堂研究论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编有《大家小集:林语堂集》(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等。此外,李勇著有《林语堂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南京等地的著名高校中有多部以林语堂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如陈琳琳的《论三十年代林语堂及其为代表的论语派》(复旦大学2001年)、施萍的《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复旦大学2004年)、杨柳的《林语堂翻译研究:审美现代性》(南京大学2004年)、王少娣的《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东方主义与东方文化情绪的矛盾统一》(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陶

① 台湾在林语堂去世后建立了纪念馆,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即林语堂故居所在地。

② 参见张桂兴:《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此次会议的另一成果为学术论文集《走近幽默大师》(陈煜斓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论文52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现状和水平。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

丽霞的《文化观与翻译观——鲁迅、林语堂文化翻译对比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年)、冯智强的《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等,其中许多已经正式出版。

(3)京。主要以王兆胜为代表。他是继万平近、施建伟之后涌现出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林语堂研究专家”:已发表几十篇论文,出版十余种图书,如《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 年版)、《解读林语堂经典》(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文津出版社 2005 年版)、《林语堂大传》(作家出版社 2005 年版)、《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林语堂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等。袁济喜近年来也多有涉足,发表了若干相关论文和著作,如《承续与超越——20 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① 此外有郭晓鸿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4 年)。顺便提及山东大学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董燕的《论林语堂文化追求的审美现代性倾向》(2005 年)和丛坤赤的《林语堂生活美学研究》(2011 年)。

3. “传、评、论”立体呈现:当代林语堂研究的主要特色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当代林语堂研究大致有如下特色:

(1)以发掘资料为主,形成了多样化的传记写作。目前关于林语堂的传记已出版了近十种,像万平近、施建伟、李勇、王兆胜等都是既写“传”,又写“评传”,他们从文学家、国学家、自由知识分子等不同身份角度鲜活地再现了林语堂这一历史人物。

(2)以关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文学思想为主。与多数文学史评价类似,肯定林语堂这段时期的文学成就,重点突出他在现代散文写作以及“论语派”形成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① 该书选择朱光潜、宗白华与林语堂三人,通过详尽分析其学说思想的承继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以揭示 20 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的天然血缘关系,并说明其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创新、应变等重大美学问题。

(3)以文化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如万平近、施建伟、王兆胜、施萍、郭晓鸿等侧重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如袁济喜、陈琳琳、丛坤亦侧重美学思想的分析;如杨柳、王少娣、陶丽霞、冯智强等从语言学、翻译学或文化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应该说,目前“林语堂热”的形成是与众多研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分不开的。他们从各种角度,借助各种理论,多元展示了林语堂的文学成就、文化形象与历史地位。

(二)主要成就

当代林语堂研究成果众多,此处不可能全面涉及,现只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次相对学理性的概括。

1. 自由主义与启蒙意向的双向肯定

由于与鲁迅的非常关系,林语堂一度被置于主流之外,林语堂研究也曾一度游离于主流研究视野之外,但这方面的翻案性文章不少。在梳理两人微妙复杂的关系中,不少学者从启蒙意向向上肯定林语堂的自由主义立场。陈漱渝认为,鲁迅和林语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过各自的贡献,他们的“相得”与“相离”只是反映着作家不同的人生追求和文化抉择,所以他比较肯定林语堂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①董大中从交往、比较、溯源三方面对两人进行了全面评价,其中重点分析两人在对待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方面的异同。虽然鲁迅是全书的“主角”,但将林语堂与鲁迅相提并论,也凸显了林语堂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②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思想容易惹人注意。因此,“性灵”、“幽默”、“闲适”等关键词成为后人研究的重点。如陈子善通过“性灵”揭示林语堂与晚明文学的关系,把他与周作人等放在一起讨论,并将他们作为

^① 参见陈漱渝:《“相得”与“相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

^② 参见董大中:《鲁迅与林语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